

#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



南华大学

#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室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长沙

##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哲学研究室**

**责任编辑：张桂岳**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0年6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2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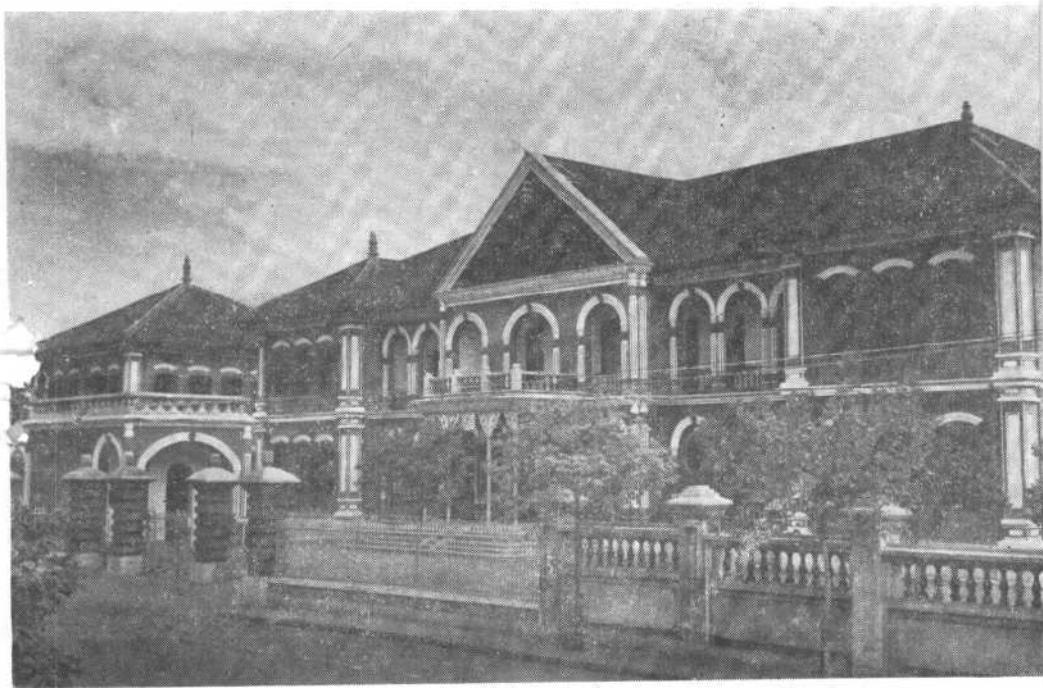
**字数：134,000 印张：5.875 印数：3,001—9,200**

**统一书号：2109·22 定价：0.64元**

毛泽东同志（一九一八年）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講堂錄

白洋車上居明儒學多。

大學書。宋包公理學文之有宋

與同人

立如花真氣素雅而文雅伊尹尚之任家風

今家父之風也。方不無

崇明而好古。誠明而折衷。中庸不以考。仁厚足也。

人心即天命。以日人就日。就天。天居何遠也。則唯少許

不過于人得失。斷得失知。然加工辦著。奉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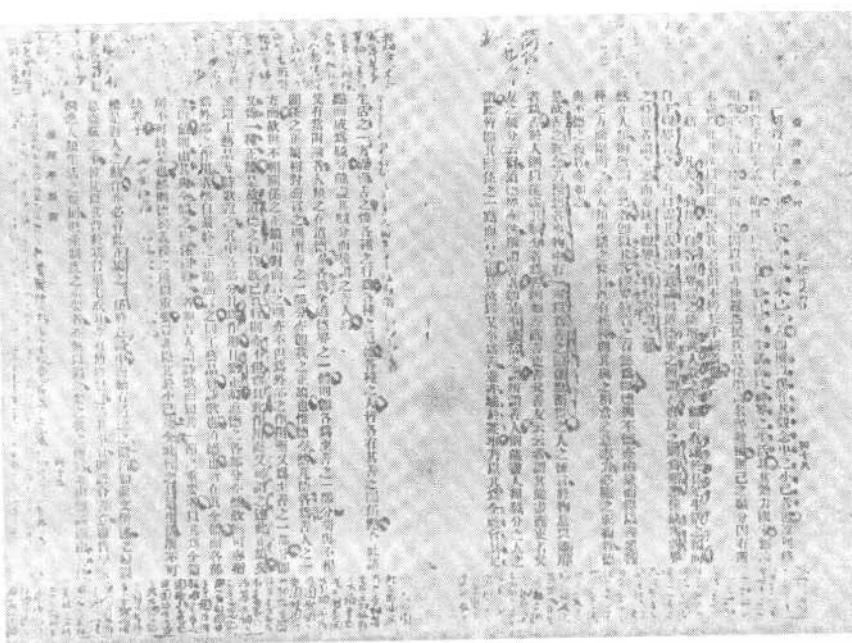
儀文寫字。人復顧倒取。力故曲做。字宜擇。筆宜直。文

自傳。依註之。或成文。或成字。或成句。譯為今語。或成

先哲傳。擇其不誤。而擇其是也。

十一月十五日 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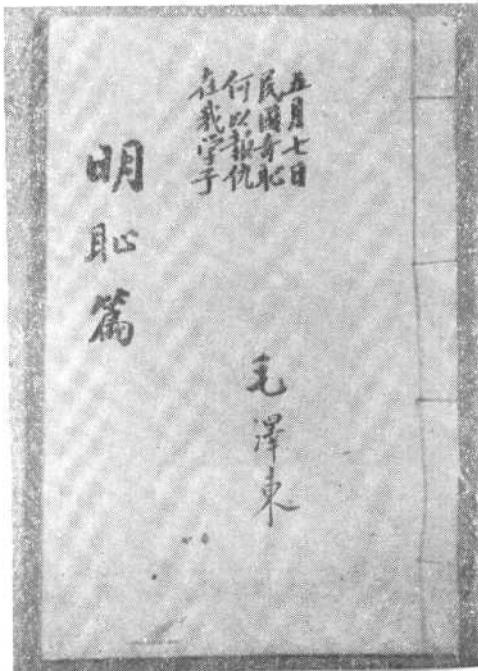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手书的《讲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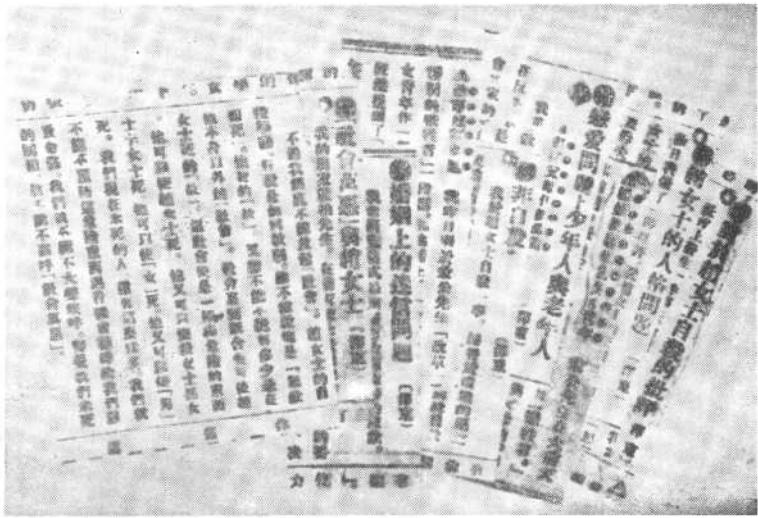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读过的《伦理学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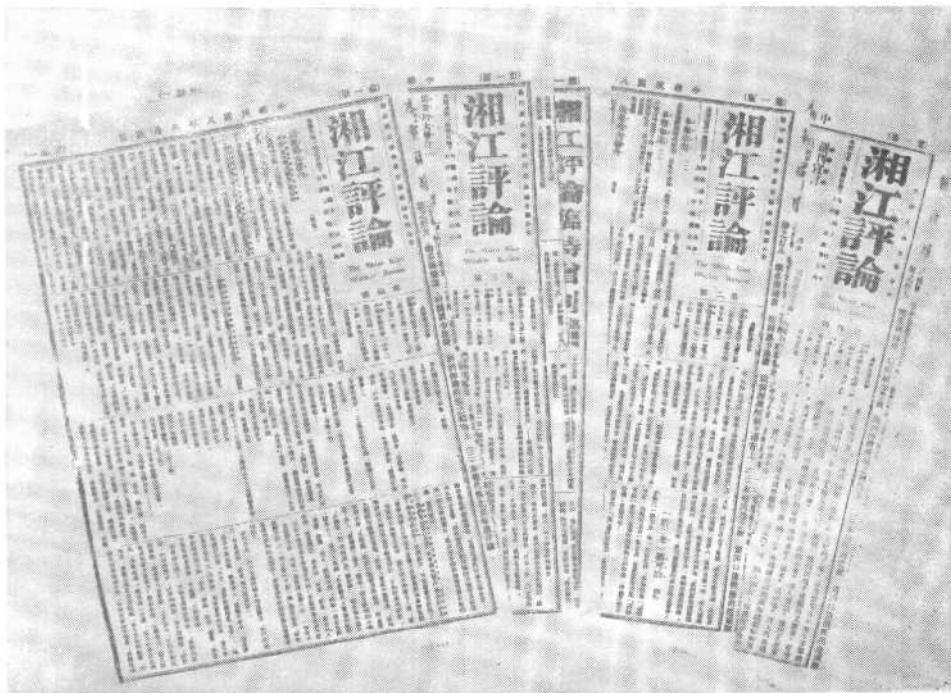
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



毛泽东同志在《明耻篇》上的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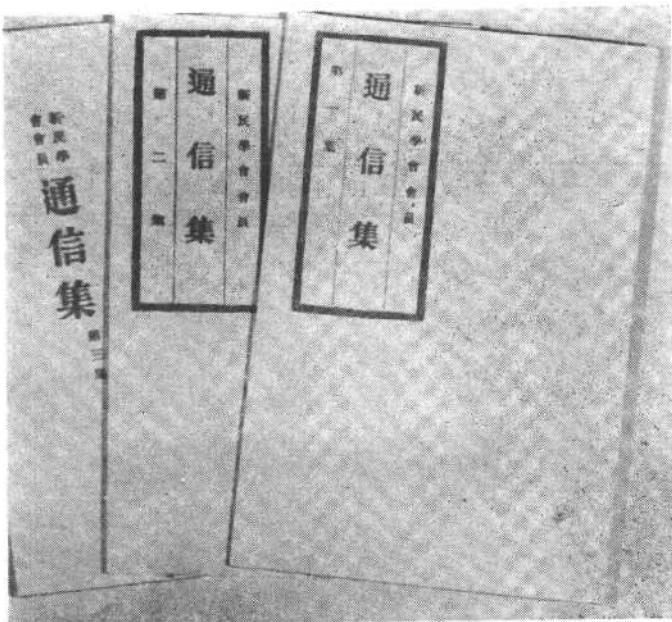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评赵女氏自杀的部分文章



《湘江评论》

#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方法問題

，這書目的須採用什麼方法

告巴黎方面要和蘇聯的提議。並云：應當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

人權、民族、政教

社會民主主義

激烈方法的生產主義（列寧的主義）

溫和方法的社會主義（羅素的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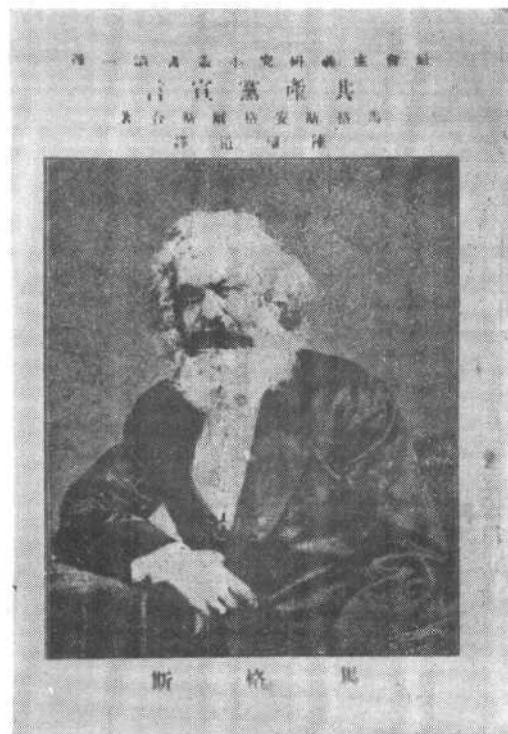
無政府主義

我們可以拿來參攷，以決定自己的方法。

於是依次發言。此時陳啟民到會。  
司叔衡：主張蘇聯主義的陳繼、林衡、十年的教育。我未聽此話。  
毛澤之：我的意見與何叔大同。蘇聯政策是溫和的政策，不成極  
主社會主義。我一言讓日滿改造工具，但事實上溫和的立場總是保護有產  
階級的。無政府主義是權力。極主義恐怕永遠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  
共產主義，如果某所上層階級的自由放在資本主義是不能推廣不同的。  
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動主義。用階級斗争的方式，是可以預計結果  
的，故最宜採用。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之一页

《共产党宣言》最早  
的中译本



毛泽东同志（一九二〇年）

# 目 录

前 言 .....	( 1 )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读《<伦理学原理>批语》兼论毛泽东一师时期的	
哲学观点 .....	( 8 )
一 时代 思潮 学校 老师 .....	( 9 )
二 “精神不灭、物质不灭” .....	( 18 )
“开始也还是迷信的”(18) 一个重大的突破 (20)	
时间和空间观念 (25) 真理天然之事 (32)	
三 辩证的思考 .....	( 37 )
“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38) 透视“河出潼关， 风回三峡”(41) 毁旧宇宙得新宇宙 (44) 某些相对 主义 (46)	
四 改造伦理学的尝试 .....	( 47 )
小我与大我利己与利他 (48) 善恶正邪具足生活 (53)	
动机与效果 (58) 以实践至善为义务 (63)	
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毛泽东一九一九年前后哲学思想探讨 .....	( 66 )
一 在斗争中学习 .....	( 66 )
二 “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	( 71 )
反对迷信和盲从 (71) 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统一 (79)	
三 新思潮中的发展观 .....	( 83 )

善于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 (83) 把握事物发展的总趋势 (88)	
四 唯物史观的初步确立	..... (92)
漫话社会存在的地位和作用 (93) 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尝试 (96)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99)	
五 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	..... (104)
根本转变的完成	
——毛泽东第二次赴京到党成立前哲学思想探讨	..... (110)
一 完成根本转变的主要标志	..... (111)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深刻意义 (112)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几个基本原则 (117)	
二 完成根本转变的基本条件	..... (135)
时代的推动历史的必然 (135) 主观原因的分析 (136)	
三 若干基本特点的探讨	..... (145)
<附录>	
毛泽东早期活动简表	..... (154)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61/17

## 前　　言

对于人类解放的壮丽事业来说，“哲学是它的头脑，无产阶级是它的心脏。”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十分生动、十分深刻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间血肉相联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归结为它的两个最显著特点之一。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青年时期对哲学都有浓厚的兴趣。马克思少年时代就爱好哲学，十九岁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二十三岁时以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列宁十七岁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二十四岁写出了第一部理论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此后从未中断过对哲学的研究。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以哲学作为学习的重点之一，还和蔡和森等同志组织了哲学研究小组。二十四岁时，他在《新青年》发表了具有丰富哲学思想的《体育之研究》，写下了读《伦理学原理》的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同时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出了许多对哲学的见解：认为真要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求得宇宙的真理，作为自己言论、行动的准则；希望“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改换全国之思想。”到

一九二一年初，毛泽东同志更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期革命活动的共同特点来看，他们爱好哲学不是个人的兴趣使然，也不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寻求真理改造世界。在他们心目中，理论本身不是目标，而是斗争的武器。毛泽东同志的早期哲学思想，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点。

正象马克思和列宁的青年时代，有一个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一样，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一九六四年，他在一次谈话中曾谈到这一点。他说，我的历史是从不觉悟到觉悟，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如果说我一开始就是马列主义者，那是不正确的。如果说我什么都懂，也不正确。可是，多年以来，林彪、“四人帮”却故意违背毛泽东同志这个思想，竭力制造现代迷信，疯狂地宣扬唯心论的天才论。他们把毛泽东同志说成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特殊的“天才”，是应天命而生的“先哲”。他们用“顶峰”、“最高最活”、“绝对权威”等“最最革命”的词句，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凝固不变的“永恒真理”。在他们横行的年月里，不仅把讲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还需要不断发展”当作是十恶不赦的“渎圣”大罪；而且连毛泽东同志早期哲学思想的研究也被列为“禁区”，不许说毛泽东思想有一个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他们控制下的宣传工具，采取歪曲事实、编造谎言的手法，把毛泽东同志说成是一个从小就“破除迷信，相信科学”，具有各种各样“天才”的“神童”。

粉碎“四人帮”，理论工作得解放。我们这个小册子，也是冲破禁区的一种尝试。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想打破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说明毛泽东同

志是人而不是神，他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样，其世界观也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世界上没有什么先天的“圣哲”，也没有什么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根本不要相信那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类的唯心之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实践的产物，时代的真理。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决不是因为象林彪、“四人帮”所吹嘘的那样，是什么几百几千年还找不到的“天才”，而是因为他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深深地扎根于群众、扎根于实践之中，能够牢牢地把握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毛泽东同志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天才论”时，曾经说过：“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回顾一下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论断是完全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一八年夏天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以前，由于社会、家庭，以及十三年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旧教育的影响，世界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和二元论的。一师毕业以后，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促使他放弃了长期自学的打算，转而从事政治斗争，并且在第一次去北京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期间，毛泽东同志通过总结中国人民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践经验，和他自己领导湖南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的实践经验，以及对马列主义著作的深入钻研和学习，认识到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并明确指出唯有“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唯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故“最宜采用”，从而使他从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从一个唯心主义者转变为

一个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在以后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又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可见，实践出真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公式，对于整个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来说是真理，对于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的思想发展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 程来说，同样是真理。

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早期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是在我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考虑一九七八年研究工作规划时，开始提出了这个选题。大家感到，探讨毛泽东同志的早期哲学思想，既是光荣的任务，也是艰巨的任务。除了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不相适应以外，从客观上说，我们手头上掌握的材料有限。特别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早期思想中的局限性和缺点，更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虽然也意识到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反映和分析，但具体如何处理却没有把握。因此，对我们来说，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和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在党中央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我们通过重温我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的光荣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在五四前后的革命实践和著作，进一步体会到思想解放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从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实践活动中得到了许多如何解放思想的启示。

毛泽东同志在其早期革命活动中积极主张思想解放，态度十分鲜明。一九一七年，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谈到自己的状况时，坦然声述：“性不好束缚”。随着革命实践的锤炼，他逐步突破

了追求抽象的个人意志自由的局限，进而把思想解放与追求革命真理结合起来，从而使他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例如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阐明彻底研究各种新思想的态度时强调：“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正是这种追求真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使他敢于向旧社会的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同时也敢于和一切披着时髦外衣的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如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决裂。

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善于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不盲从，不迷信。他特别强调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正是由于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使毛泽东同志能够正确地分析客观形势，也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与日俱进。正是这种革命的批判的态度，使毛泽东同志能够不断抛弃那些过了时的、错误的学说和观点，最终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当毛泽东同志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唯一正确真理以后，便对它坚信不疑，毫不动摇地运用它的基本原理，去指导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然后又用中国革命的新鲜经验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样，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万古不变的教条，而是使它和实际生活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永葆其美妙之青春。

回顾五四运动和毛泽东同志思想转变的历史，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有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今天，我们正经历着一次比五四时期规模更加广泛、内容更加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我

们深信，通过这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定能够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也一定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是在中国的土壤上产生的，因而具有民族的风格，这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就已显露出来。他注意不断地吸收和改造我国古代哲学的一些范畴和原理。例如张横渠、王夫之等人提出：气（指物质）只有聚散、并无生灭的命题，表述他们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毛泽东同志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就发挥了这个命题，指出：“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生死也皆变化也。”这和他的“物质不灭”这个重要观点是相通的。而对孔、孟宣扬的圣人生而知之、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则作为反面例证，加以批判。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直指这些观点“不可信”，认为“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毛泽东同志还引用我国古代的成语典故，充实了自己的论证，如：《讲堂录》中有“大禹惜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等；《体育之研究》中有“三过其门而不入”，“西山之薇”，“心在鸿鹄”，“力拔山兮气盖世”，“十荡十决”，“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等；《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引用《庄子》的就有几处。这些，不仅丰富了他的哲学思想，而且增添了他文章的光采。

对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变化进行探索和研究，是一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也是哲学工作者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本书的几个作者（李羽立、王兴国、李吉、黄国秋）自知缺乏理论研究的经验，但从上述认识出发也就承担了这个科研项目。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们力求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是毕竟由于理论修养和思想水平的限制，所以成绩甚